

互惠与正义：大学与城市协同发展的空间逻辑

——以英国大伦敦区为例

沈蕾娜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大学与城市都是全球、区域和本地维度交织的空间。作为不同属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二者既有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层面的相互嵌入，又有精神空间层面的相互疏离。英国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工业之都、金融之都和知识之都的城市转型中高等教育形式、类型和体系的创新发展，又体现在追求经济层面互惠互利和城市发展空间正义中高等教育职能和机制的拓展。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策推动以及高校层面的合作机制促进大伦敦区高校与城市形成深度融合的协同共生关系。在城市与大学的发展中，既要重视互惠互利关系，又要强调空间正义导向，发挥大学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大学；城市；协同发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 (2020) 11-0088-08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它们既相互依赖，又可能相互背离。一方面，大学作为所在城市“支柱机构”（anchor institution）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黏性资本”（sticky capital）；^[1] 另一方面，大学追求的是普遍知识，国家对精英大学的政策又强调超越地域限制，同时大学评价和排名看重的是大学学术研究的卓越程度，而非对本地的服务。对于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资源分配来说，大学在土地等方面的扩张也可能与城市发展利益相悖。因此，管控分歧、实现互惠成为大学与城市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伦敦、纽约等是世界级城市，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密集地。在2019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中，伦敦连续十年蝉联三甲，并凭借在创新上的稳定表现成

为全球最具潜力城市。伦敦的突出表现与其高等教育成就密不可分。大伦敦区（the Greater London）聚集了4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是英国高校最密集、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在全球四大世界大学排名上唯一拥有4所世界前50名高校的区域。其中，伦敦大学联邦拥有17个附属学院和10个研究机构，它们之间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有效应对了城市与大学发展的二律背反，在促进伦敦城市发展和空间均衡的同时，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系统。研究大伦敦区与其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互动机制，对我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对标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谋划以“四点一线一面”为重点的战略布局、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引领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稿日期：2020-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城市群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及推进策略研究”（CIA150188）

作者简介：沈蕾娜，女，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要从事比较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一、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市协同发展的时空脉络

从历史来看,大学与城市由相互疏离走向互动发展,逐步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大学因城市而盛,城市因大学而兴。^[3]大学的起源与城市的出现密切相关,大学与城市形成了动态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从最初依靠大学溢出效应间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大学对地方经济更加正式和制度化的引领作用。^[4]19世纪,现代大学“第一次学术革命”将科学研究置于重要位置,科学研究因追求知识的普遍性而强调超越地域限制,造成大学与所在城市的割裂。^[5]以知识的商业化标志的“第二次学术革命”,强调大学要承担地区发展、创新和领导的职责。19世纪以来,大伦敦区的高等教育与城市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互动模式。大学长期重视城市的需要,并适时变革以适应城市;城市为大学提供资源和需求,大学生长与城市发展动态契合并深度融合。大学与伦敦的政治、经济、文化融会贯通,彼此深度对接,大学与城市融合共生,协同共进。^[6]

(一) 工业之都与新大学:基于人才培养的协同

从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使伦敦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城市。从英美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时会呈现出繁荣发展与矛盾凸显并存的现象,即出现城市化拐点,此时高等教育表现出明显的适用性走向和民主化走向,帮助两国顺利渡过城市化拐点。^[7]为满足快速增长的工业社会的需求和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伦敦市迫切需要超越传统的古典大学模式,创办新式大学,从古典化转向世俗化、平民化和泛智化。与旧大学相比,新大学倾向于把地区经济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8]它们的创建得到了本地富有财团的支持,更加强调科学和技术学科(包括医学),而这些学科对新兴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工人健康非常实用。^[9]大伦敦区建立新型大学的迫切需要与其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碰撞,共同催生了

伦敦大学。作为大伦敦区的第一所高校,伦敦大学在创建初期由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两所完全独立的学院组成,开设了法律、医学、工程学、化学、政治经济学等现代科学课程,培养各个领域所急需的人才,以促进大伦敦区社会经济发展。1835年,这两所学院达成协议,决定成立新的伦敦大学,并将二者置于新的机构之下。在这一时期,虽然大伦敦区在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下建立了与传统大学截然不同的伦敦大学,但是高校和政府、产业、社区之间并没有形成深入的互动关系。大伦敦区的高校依然是与社会隔离的象牙塔,与城市的互动也仅限于人才培养方面。然而,伦敦大学以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等方式迈出了高等教育与城市共生的第一步,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实现了共赢,推动了新式大学的建立和伦敦作为工业之都的形成。

(二) 金融之都与大学发展:基于城市转型的协同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伦敦经济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并成为服务经济主导的城市。19世纪70年代,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60%,远高于同期的巴黎和柏林。^[10]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整个金融服务业每年对GDP的贡献在5.5%到6.5%之间(2010年达到近9%),其中一半的产值来自伦敦。^[11]不断增长的城市服务经济体系直接带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城市产业空间重组的进程中,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大区域城市空间要素的集约化,使城市形成了各种特色城区。^[12]自20世纪80年代起,伦敦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明显的等级体系和功能定位,空间分布呈现出多极化、等级化、功能化特征。城市中心主要承担高级商业服务,内城区和郊外的新兴商务区则主要面向国内或当地制造业,彼此之间密切协作。^[13]与产业转型和城市空间布局相适应,大伦敦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向城市中心集聚,继续教育机构分布向城市外围扩散,内伦敦地区高等教育层次、水平及规模明显高

于外伦敦地区,伦敦的5所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学院均分布在内伦敦地区。^[13]在此期间,大伦敦区建立了多所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多科技术学院。二战后根据《罗宾斯报告》的建议,大伦敦区内的布鲁奈尔大学和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完成向高等技术学院的升格。这些学院多为大伦敦区内的小型技术学院或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工程类、应用类学科是其传统学科领域。1966年成立的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开设了机械工程、工艺美术、应用物理学、钟表、家庭经济学等领域的课程,这些课程和专业支撑着伦敦市服务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大伦敦区的高等技术教育与城市的互动逐渐增多,在人才培养方面更加强调为本地发展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强调与城市产业特色及发展方向紧密结合,同时课程教学与社区普及相结合。伦敦城市大学的城市校区就坐落在金融城,伦敦城市大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等皆以金融城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和毕业生就业标的。^[14]在这种背景下,大伦敦区高等教育和城市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传统产业结构转型上,交互活动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有所加强,但相互牵引的主导作用仍不明显。

(三)“知识之都”与多元化大学:基于未来发展的协同

随着“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知识的形态、生产方式和评判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经济由于知识的深度参与也发生了深刻转型,知识与经济的“双重转型”带来大学发展范式的转变。^[15]进入21世纪,大伦敦政府将大伦敦区定位为“知识之都”,借助创意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再次优化和升级。2015年,大伦敦区创意产业增加值达420亿英镑,占伦敦市全部产业增加值的11.1%,同时也占整个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的47.4%。^[16]《伦敦1991—2021:建设世界城市》(London 1991—2021: The Building of a World City)、《伦敦创新战略与行动计划2003—2006》(The London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03—2006)、《世界城市,世界知识》(World City, World Knowledge)、《伦敦——知识型首都》(London: The Knowledge Capital)、《伦

敦规划2020年(草案)》[London Plan 2020 (draft)]等大伦敦区政府的报告都把高等教育视为城市发展的优势所在,强调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的相辅相成。此时,大伦敦区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涵盖了联邦制伦敦大学中5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学院、10所英国高水平学术型大学、13所由多科技术学院升格的教学与应用型大学、14所专业性人才培养大学。^[17]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科专业设置与本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保持高度吻合。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2018—2019学年的数据,伦敦地区高校各专业在校生人数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商务管理(14.96%)、创意设计(11.93%)、医学相关学科(11.28%)、社会科学(10.27%)和生物科学(8.48%),而占比最低的是农业及相关学科(0.32%)和兽医(0.48%)。^[18]相较于英国其他地区,大伦敦地区的信息通讯、科技活动、金融保险、房地产、行政管理、文娱产业的从业人员较多。正是这些产业带动了伦敦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而这些产业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与伦敦地区高校的优势学科专业和重点培养的人才类型相匹配。在大伦敦区经济转型下,大伦敦区高等教育和城市发展在物质基础、管理制度、政策环境构成的共生单元中趋于稳定和成熟,两者在互相适应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相互牵引性,进入协同共生的状态。

二、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市发展的协同机制

大伦敦区经历了从工业城市到金融中心,再到“创意之都”的两次城市转型。与此相应,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也从创办新型的伦敦大学,到发展高等技术教育,再到建立统一的多样性高等教育体系,城市转型与大学发展表现出同频共振的协同共生效应。二者的协同共生源于国家、区域和大学层面的政策引导和机制推动。

(一)政策机制:国家与地方政策对大学参与职能的强调

从国家层面而言,1997年,英国《迪尔英

报告》(The Dearing Report)就强调了大学对地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多重影响,包括对文化旅游和社区发展的影响。由于政策议程的转变,城市中的大学不再过于强调国家要求和宏观研究,而是更加关注地方和区域发展。^[19]近20年来,英国决策者和学者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大学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提高人力资本和推进地区知识创新方面的作用。2017年,英国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发布的白皮书《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Future)指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清洁增长、未来交通运输和老龄化是英国未来工业发展的四大挑战。白皮书特别强调了大学对所在地区日益重要的贡献,其中“地区”一词被提到了150余次。白皮书认为,大学在“本地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要使用专项基金(高等教育创新基金)资助大学与本地企业、公司和其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20]在《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的指引下,高等教育更密切地参与本地经济发展,积极进行技术转化和各种形式的商业合作。从英国政府推动的大学绩效评价来说,近些年英国“大学科研卓越框架”(REF)在评价大学的科研影响力时,不再采用单纯的学术指标,而是考量了大学科研对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2020年英国启动的“大学知识交流评估框架”(KEF)也强调将大学资源转化到所在地区,以及大学从所在地区汲取经验和智慧。作为一种新的大学评价,“大学知识交流评估框架”界定了大学的参与职能,将“参与”作为大学与本地企业、社会或经济之间的一种知识信息交换关系。^[21]这种评价导向对促进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本地城市协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从地区层面而言,大伦敦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知识转移、技术孵化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把高等教育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和战略性产业,并在大伦敦城市规划战略中不断强化高等教育的独特作用,明确其功能定位。2000年由伦敦发展局牵头,15个部属部门、10个民间协会共同合作制定的

《伦敦科学、知识与创新战略规划》就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不仅担负着基础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责任,还有义务改造传统工业、扶持新的知识型企业,成为推动创新和变革的强大动力。^[22]2003年,伦敦发展局公布的《伦敦创新战略与行动计划(2003—2006)》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机构除进行知识创新外,还要对所在市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直接贡献。^[23]自2003年大伦敦政府出台创意产业发展相关战略以来,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关注相关学科发展,注重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科学研究创新性。2018年,《伦敦人技能战略》(Skills for Londoners strategy)提出要建立一套16岁后的技术与职业教育系统,以满足伦敦人和伦敦商业发展的需要。此外,大伦敦政府还把高等教育作为城市亮点进行城市公关宣传,营造伦敦高校在教育市场的优势。^[24]大伦敦区政府通过编写宣传材料、学生手册、资助活动等方式,以官方的身份积极宣传大伦敦区高等教育,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求学。大伦敦城市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已融为一体。

(二) 运行机制:高校和政府、产业、社区的跨界耦合

大学与城市的互动,主要是将大学发展的“地区维度”嵌入和融入教学和科研等关键职能中,促进社会包容和流动,提供技能培训,通过基础科学研究推动创新。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背景下,英国大学特别强调知识生产的情境性、异质性、跨学科性、社会弥散性和反思性。^[25]知识交流框架是英国大学与本地企业、公共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一种多重互动和双向交流机制,它不仅包括商业化的知识转化,也包括非商业化的服务性学习等活动,旨在创造更大的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效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体验。^[26]大伦敦区高等教育和政府、产业、社区的跨界耦合,主要通过以下两大机制来实现。

1. 地区性高等教育联盟的协调机制

伦敦高等教育联盟(London Higher)成立于1999年,是本区域最大的高校联盟组织,也是大伦敦区最具影响力的中介组织。作为一个

高等教育机构密集的城市，如果全由市场逻辑支配，大伦敦区各高校之间必然会争夺相同的生源、经费以及各类投入。伦敦高等教育联盟的建立旨在维护大伦敦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整体利益，促进良性竞争，提升各类大学的办学质量和产出。对内而言，伦敦高等教育联盟建立了成员校之间的合作机制和网络，协同行动和分享经验；对外而言，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外部支持和提升社会影响力。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伦敦高等教育联盟与市长办公室、大伦敦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伦敦本地企业联盟、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公平入学办公室、学生事务办公室等公共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推动教学、科研和学生事务等多项工作。为加强区域内高校的合作和协同，伦敦高等教育联盟成立了25个专业领域的合作网络，其下设的伦敦城市研究网络由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伦敦城市大学等11所伦敦最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组成。这个网络聚焦大伦敦区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如交通、住房、虚拟技术、伦敦商业改善区、公共卫生等，促使成员校根据各自科研优势，专攻相关研究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跨学科解决方案。

2. 大学的知识交流机制

2018年，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在机构整合的基础上成立，下设英格兰研究委员会（Research England），承担此前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研究和知识转化职责。英格兰研究委员会的发展基金（Research England Development）每年提供2700万英镑，资助大学、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合作项目，促进高等教育的研究和知识转化。大伦敦区共有28所高等教育机构相继建立了知识交流机制，帝国理工大学、伦敦大学癌症研究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皇家艺术学院、东伦敦大学等5所高校在知识交流方面成就卓著。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在大学发展战略中提出，所有院系的科研战略目标都要突出和激励知识交流与商业化，并将其作为新的绩效管理目标。布鲁纳尔大学则提出要扩大科研的影响力，聚焦企业、商业化和知识转化，并将其作

为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和皇家音乐学院将知识交流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上，积极推进创新创业，以支撑和驱动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27]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为例，其知识交流机制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成立了创业学院，为师生实现创意提供支持，提供各式各样的创业服务活动；二是建立了商业化研究所，为学者与企业、投资者搭建平台，既使研究者能够接触并获得商业融资，也使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大学的前沿研究中获益；三是将健康卫生领域和工程领域确定为重点学科，服务于大伦敦区的未来发展；四是依托伦敦市提升就读体验，将大伦敦区作为“生活课堂”，在所有院系开设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项目，提升学生就读体验；五是合作开展研究活动，将伦敦作为“生活实验室”，为伦敦应对的机遇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六是开展伦敦社区服务活动，更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优势，服务伦敦社区。

（三）均衡机制：大学与城市发展的空间正义

空间的本质是社会性，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场所，也是形塑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的空间化，是社会正义的价值理念对特定空间生产的价值评价，它体现在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方面，前者是对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和获取，后者是城市与其社群的协调和决策过程。^[28]空间正义就是要消除因阶层、种族或性别而产生的对城市特定群体的地域偏见，以及城市空间中特权和优先权的再生产。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城市社会理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维统一体。^[29]从城市社会的协调性、中心性和差异性三个特征来说，城市大学需要内化和协调知识生产的抽象性与本地化、城市社会的中心与外围以及大学的制度化与解放性功能之间的矛盾。协调性要求大学打开封闭的物理和精神空间，整合多样性的知识，建构去中心化的政策、实践和影响力网络，实现抽象与具体以及结构与经验的协调。中心性要求大学能够为城市边缘群体赋权增能，通过适当的空间参与方式或教学方式变

革满足非传统学生的需要。差异性要求大学重建制度和文 化, 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 为社 会正义和民主化的知识生产创造空间。^[30] 对城市大学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地理空间层面, 还要重视城市化社会关系中诸多矛盾的内化和协调过程。大学在城市空间的控制和生产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并深度卷入了当代城市的空间政治和空间正义中。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城市空间的平衡和公平成为大伦敦区规划的核心战略。伦敦市高等教育机构在促进城市均衡发展、振兴薄弱地区中被赋予重任。21 世纪初, 东伦敦地区长期衰败, 住房状况较差, 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为促进公平, 2004 年伦敦城市规划确定了沿泰晤士河口地区发展走廊和伦敦-斯坦斯塔德-剑桥发展走廊这两大空间走廊振兴东伦敦地区。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主场地也选择在这两条走廊的交汇点上, 并借此兴建基础设施, 改善本地区公共交通能力。同时, 伦敦规划还设置了复兴区域, 涵盖了大伦敦区 20% 的最贫困地区, 大部分也坐落在东伦敦地区。位于该区的东伦敦大学, 借助码头区域的发展和奥运会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担负起振兴东伦敦地区的重任, 其新建立的 RIX 中心 (RIX Research & Media) 通过跨学科、跨商业部门的合作和规模化运营, 形成一条连接中小型企业、地方当局、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完整产业链。同时, 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 伦敦市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其他高校也在东伦敦地区建立新的校区, 以支撑东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重建奥运会遗留场地, 伦敦政府为东岸地区提供 1.51 亿英镑的总投资, 伦敦大学学院的东校区建设获得 1 亿英镑的补贴。作为回报, 伦敦大学学院把东区的城市转型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 将重点学术领域放在实验、艺术、社会与技术上, 努力将东区建成未来知识经济社会的新中心, 为处于社会极化的东伦敦地区打开“机会之门”, 这种定位也拓展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制度传统。此外, 伦敦时装学院和拉夫堡大学也在这里建立校区, 以促进东伦敦地区振兴。大伦敦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城市空间建设中不再单纯强调

以创新创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而是从文化制度层面突破传统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结构化实践, 为处于城市外围的贫困地区和非传统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机会, 以实现城市大学在空间层面的解放功能。

三、结语

都市社会学家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指出, 尽管社会结构是全球的, 但从地域和文化的角度而言, 人们的大部分体验是地方的。^[31] 大学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不仅是重要的知识产业, 而且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主要供给者。城市不仅是大学的空间场所, 而且可以成为大学科研的“生活实验室”, 芝加哥大学一流社会学的形成就得益于对芝加哥城市问题的研究。大学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既要从“互惠”的角度思考“如何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快”, 又要从“正义”的角度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应当”。换言之, 推进大学与城市的协同发展, 既要从互惠互利的角度推进大学与城市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与相互嵌入, 又要从空间正义的角度推进大学在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关键作用, 实现城市的协调发展与人的解放, 消除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的非正义等问题。此外, 还要管控好大学与城市之间的背离和冲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 特别强调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 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在新发展阶段, “空间正义”逐步凸显, 并成为协调发展的优先性价值, 它不仅体现在地域空间和生存空间中, 也隐含于发展空间和价值空间中。^[32] 推进教育现代化, 需要加快我国城市高等教育的布局优化, 使大学与城市形成相互促进的协同共生关系。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 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为中心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群, 要让中心城市真正成为未来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必然要面对高等教育和城市协同发展的挑战。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发展值得借鉴：一是注重内部协同，推动高等教育机构从分散走向集群，构建具有良好秩序和结构层次的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二是注重外部协同，在促进城市依靠知识和技术创新实现转型的同时，加快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推动大学与城市实现协同共生；三是注重均衡机制，发挥高等教育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均衡器”作用，实现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和区域振兴同频共振。面向未来，需要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发挥各级各类优质高等教育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城市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GODDARD J, COOMBES M, KEMPTON L, VALLANCE P. Universities as anchor institutions in cities in a turbulent funding environment: vulnerable institutions and vulnerable places in England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4, 7 (2): 307-325.
- [2] 刘晖, 李嘉慧. 论大学与城市发展的时空逻辑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 (5): 1-7.
- [3] ADDIE J P D, KEIL R, OLDS K. Beyond town and gown: universities, territorialit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new urban structures in Canada [J].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2015, 3 (1): 27-50.
- [4] BENDER 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
- [5] [14] 张臻汉, 赵世奎, 张彦通. 英国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研究 [J]. 江苏高教, 2014 (3): 146-149.
- [6] 张振, 武毅英. 英美城市化拐点中的高等教育走向及启示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12): 73-77.
- [7] CHARLES D. Universities as key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J].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6, 19 (1): 117-130.
- [8] WALSH J. The university movement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 Northern history, 2009, 46 (1): 113-131.
- [9] 左学金, 王红霞, 等. 世界城市空间转型与产业转型比较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70.
- [10] SCHENK C R. The cit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Brexit Debate [J].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2019, 90 (S2): 32-43.
- [11] 王燕, 张辉. 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城市转型 [N]. 光明日报, 2015-06-10 (15).
- [12] 王鹏, 张秀生. 国外城市群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6 (4): 115-122.
- [13] [23] 郭婧. 知识城市模式下伦敦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特点研究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4, 36 (7): 56-62.
- [15] 刘小强, 黄知弦, 蒋喜锋. 知识、经济的双重转型与一流大学建设的范式转变——新加坡国立大学建设“全球知识企业”实践和启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 40 (4): 64-70.
- [16] ROCKS C. London's creative industries—2017 update [R]. GLA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89, 2017.
- [17] [22] 夏人青. 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39-82.
- [18] HESA.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statistics: UK, 2018/19 [EB/OL]. (2020-01-16) [2020-09-15]. <https://www.hesa.ac.uk/news/16-01-2020/sb255-higher-education-student-statistics>.
- [19] UYARRAA E. Conceptualizing the regional roles of universities, implic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0, 18 (8): 1227-1246.
- [20] JOHNSTON A, WELLS P. Assessing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a place-based Industrial Strategy: evidence from the UK [J]. Local economy,

2020, 35 (4): 384-402.

[21] JOHNSON T. The knowledge exchange framework: understanding parameters and the capacity for transformative engagement [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20 (3): 1-18.

[24] 刘海波, 陈亚伟, 田华. 不同发展水平下发达城市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伦敦、上海、宁波为例 [C]//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 2006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年会会议论文集, 2006: 12.

[25] 陈洪捷.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博士质量的危机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31 (1): 57-63.

[26] SALINAS L.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exchange at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M]. Londo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2019.

[27] ADDIE J P D. Urban (izing) university strategic planning: an analysis of London and New

York city [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9, 55 (6): 1612-1645.

[28] SOJA E. The city and spatial justice [J]. Justice spatiale/spatial justice, 2009, 1 (1): 1-5.

[29] 高春花. 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理论的哲学建构及其意义 [J]. 理论视野, 2011 (8): 29-32.

[30] ADDIE, PAUL J D. From the urban university to universities in urban society [J]. Regional studies, 2016, 51 (7): 1089-1099.

[31] CASTELLS, M. Local and global: citie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548-558.

[32] 张彦, 金梦佳. 协调发展需构建“空间正义”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5 (1): 187-194.

(责任编辑 吴潇剑)

Reciprocity and Justice: the Spatial Logic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Take Greater London, Britain for Example

Shen Leina

Abstract: Both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are spaces interwoven with global, regional and local dimensions. As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y are not only embedded in natur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but also alienated from each other in spiritual space.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ity in Greater Londo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orms, types and systems in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financial and creative cities, but also in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in pursuit of mutual benefit at the economic level and spatial justice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policy promotion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 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city in Greater Lond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but also emphasize the guidance of spatial justice, so as to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Key words: University; City; Synergetic Development; Space